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社会文化编 专题二

徐 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 战争社会动员

胡 澎 / 编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徐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社会文化编 专题二

# 战争社会动员

胡澎 / 编

## 专题编者

胡 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

## 专题解说

胡 澎

### 一 关于战时“国民动员”史料搜集、整理情况的说明

战时“国民动员”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始于2010年，至今已历时6年多。本专题的相关工作说明如下。

一是对本专题的相关概念予以定义。

搜集的史料范围限定于1931~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期间，聚焦于战时体制下的“国民动员”。“战时体制”是为了战争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必要的国内体制，是一种国家总体战体制，它要求不仅在军事，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谋求国内体制的强化，以应对战争。“国民动员”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将国民集中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它是包含在总体战这一军事框架之中的。总体战要动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力量去服务战争，正如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所阐述的“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sup>①</sup>因此，统一国民思想、动员国民参与战时体制、对国民进行组织化运作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本专题的总体思路。

日本的总体战体制不仅给被侵略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国民饱受战争的伤害。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曾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经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20

---

<sup>①</sup>〔德〕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11页。

世纪 30 年代直至 40 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sup>①</sup>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当局认识到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使日本国民与军队保持一致，由上而下的动员与国民自下而上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当局逐渐在国内构筑总体战体制。1938 年出台的《国家总动员法》标志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初步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动员”与“国民统合”执行得愈加彻底。1945 年国民义勇队的建立标志着囊括全体日本国民的总动员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全体日本国民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纳入战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各种统制，那些没有被征兵的国民，被组织在町内会、部落会、邻组、农民报国联盟、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产业报国会、在乡军人会、复员军人会等各种社会基层组织里，进行着对战争体制的支持与援助。在战时体制下，国民动员与统合的实施方是日本军部、政府乃至法西斯主义翼赞团体的负责人，被动员与被统合的则是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妇女、老年人、青少年、知识分子等在内的普通日本民众。因此，总体战体制是通过“国民动员”构筑起来的一种“强制的同质化”，也就是天皇制法西斯体制。

三是梳理相关领域史料集的搜集以及研究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史料集，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007）、《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动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等。然而，针对战争期间日本高层的决策，特别是在动员和统合国内民众参与战时体制方面的敕令、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相关史料尚未在中国结集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从中国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日本研究界在对 1931~1945 年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著述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对外侵略战争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和研究。对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研究比较充分，在战后赔偿、细菌战、“慰安妇”问题上有了不少突破。但对于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积极配合与支持战

<sup>①</sup>〔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第 312~313 页。

争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进入 21 世纪以来,与本专题相关的总体战研究、国民精神总动员、家庭统制等领域出现了一批成果。例如,蒋立峰、汤重南主编的《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中有关章节从社会基础和国民意识的视角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阐述。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对侵略战争期间的日本妇女团体进行了梳理,通过官方妇女团体的活动,剖析了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对战争的支持。杨宁一的《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也分析了日本统治者如何对国民灌输“日本主义”“国体论”“大和魂”,以及“武士道”精神,使之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务于战争体制。雷国山的《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涉及了精神总动员运动。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对总体战、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动员、家庭动员、舆论动员等进行了研究。如张生、周宗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缘起析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张劲松的《“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胡月的《论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国民组织化”》(《沈阳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李卓的《战时日本的家庭动员与家庭统制》(《日本研究》1996年第4期),陈景彦、姚春海的《论日本陆军的总体战思想》(《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6期),于淼的《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舆论动员机制分析——起源、构建与社会基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 四是本专题的思想定位和主要内容。

“国民动员”相关史料的发掘,使我们看到日本当局是如何一步步激发起日本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将国民统合起来,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效力的。在本专题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我们主要围绕以下三点进行思考。首先,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是如何在思想上对日本国民进行动员的。也就是说,当局在向国民灌输天皇制国家主义意识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又是如何强化思想文化统制,使国民思想符合战时体制的要求的。其次,当局如何将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统合,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使国民在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配合时局和战时体制的需要,勤俭奉公、多生多育、增加储蓄、强健体魄等,以应对战时体制的需要。

最后，是如何将日本国民统合在大政翼赞会下的各种法西斯组织，使之服务于对外侵略战争以及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运转的。基于以上三点思考，本专题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包括三部分内容：对国民的思想动员、对国民的组织动员、对国民日常生活的动员。

五是本专题所搜集的史料的来源。

从史料来源来看，本专题主要从日方的史料集、原始档案中搜集相关史料。主要依据《资料 日本现代史》（大月书店，1984，计13卷）、《日本妇人问题资料集成》（ドメス出版、1977）、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center/center.html>）、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rnavi.ndl.go.jp/rnavi/>）、“資料に見る日本の近代”（[http://www.ndl.go.jp/modern/img\\_r/090/090-001r.html](http://www.ndl.go.jp/modern/img_r/090/090-001r.html)）、中野文库（<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hou/hs16-54.htm>）等史料集和史料库整理而成。史料的内容以当时日本高层，包括军部、内阁、各省厅、地方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为主，还搜集了相关团体，如大日本妇人会、邻组、国民义勇队等组织的内部资料。

## 二 战时“国民动员”史料集与相关史实解说

### （一）对国民的思想动员

日本当局对国民进行思想动员是随着战争的不断进展而强化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了让国民支持战争、让国民在思想上与当局保持一致，普及国防思想被作为一项重要举措。随着战争的进展，当局又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近卫新体制运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国民动员的法律。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动员早已从思想层面扩展到了行动层面。“国民动员”不仅激发了日本民众的排外情绪和极端民族主义心理，还将日本民众动员和组织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之中，使日本国民对这场不义的战争予以精神上与行动上的支持。

#### 1. 思想动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上层统治者在国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教育”活动，他们鼓吹“战争是创造之父、文明之母”，极力美化和肯定侵略战争，强

调战争的正义性，宣传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战时“銃后奉公”<sup>①</sup>思想。当局还大搞天皇崇拜，提倡“忠君爱国”，组织各种以“满蒙是日本生命线”为主旨的国防教育。各行政机构及社会团体频繁举行新闻电影放映会、讲演会，使日本民众普遍产生一种“国难来临”的强烈危机感。随着国防教育和宣传的不断深入，日本民众中支持战争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侵略战争捐款、捐物的数额也直线上升。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军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民众进行蛊惑人心的舆论宣传，其目的是为侵略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使侵略战争正当化，进而欺骗日本民众支持战争。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认为“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开辟了这样一个时代：它推进了以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对民众的动员和统一，给民众的意识与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sup>②</sup>《满洲事变与社会运动》等史料加深了日本国民对国家目标的理解和对政府“满洲”政策的支持。在战争宣传、战争鼓动的形势之下，日本国内呈现出支持战争、关心战事进展、为“出征”士兵加油鼓劲的氛围。在火车站、港口出现迎送士兵的人群，他们手中挥舞着小旗，不断高呼“万岁”；在繁华街道和百货商场门口立有为战争募捐的捐款箱；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为保佑士兵平安而缝制“千人针”<sup>③</sup>的妇女的身影……

## 2. 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为了统一国民思想，当局将开展国民教化运动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步骤。1937年6月26日，内务次官和文部次官向各厅道府县长官发布了《国民教化运动与时局宣传的通告》，通告着重分析了当时形势下开展国民教化运动的必要性，阐述了该运动是政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而做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当局为这一有可能长期持续的战争做了一系列精心布局和铺垫，为了不引起国民对战争的厌恶，当局极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一名词，将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为“支那事变”。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全面化，日本的国内体

① “銃后”一词是日文，“銃”的意思为枪，“銃后”即后方之意，战争期间指日本国内。

② [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周启乾、刘锦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59页。

③ 缝制“千人针”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兴起的一种习俗。一千名女性用红丝线将硬币缝到一块长布上做护身符，据说把它围在腰上可以刀枪不入、抵御炮弹、化险为夷。女性用此赠送给士兵。



制也在急速战时化。国民教化运动的相关文件是希望国民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持战争，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在总体战思想的指导下，1937年8月14日，内阁决定由内务省和文部省主导在全日本开展“国民思想动员运动”，即在思想上加紧战争动员。8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宣称“在以举国一致、坚忍不拔之精神应对日前时局的同时，为克服今后持续的艰难，愈益辅翼皇运，官民一体，发起一大国民运动”。

1939年发布的《内阁告谕号外》明确阐述道：

值此多事之秋，国民应齐心协力认识时局之重大，决心不顾今后局势如何之艰难，以坚忍不拔之情操，为贯彻当初之目标而果敢向前。

打破困局，图谋国运昌盛之路乃基于我尊严之国体，振奋尽忠报国之精神，于国民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乃当今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

自古以来，我国国民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国家隆盛之成果，当此之际，国民应体现如上目的，忠诚奉公、团结一心、昂扬日本精神、举国一致、付诸实践、图谋国力之日益强大、扶持皇运。此乃本大臣于全体国民之深切期待。<sup>①</sup>

在这样的告谕下，各地在政府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精神总动员活动。例如，1937年9月成立了东京府国民精神总动员实行委员会，确定了如下“实践要目”：

（一）坚忍持久精神之涵养

1. 锻炼坚韧精神
2. 坚定必胜信念
3. 训练同仇敌忾情绪

（二）忍耐困苦与物质短缺之身心锻炼

1. 勤俭厉行
2. 更新生活方式
3. 节制享乐
4. 增进体力

（三）体现舍“小我”成就“大我”之精神

（四）恪守各自职责

<sup>①</sup> 转引自土方和雄『「日本文化論」と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新日本出版社、1983），第106~107页。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以官僚机构和半官方半民间团体为中心开展的，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总动员”是直接由官方推动和执行的。1937年10月，作为推动全国精神总动员运动领导核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发布了“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等口号，将日本国民的思想和精神引导到“为了国家”和“为了天皇”。1937年11月20日，大本营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设立。1938年3月31日之前，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的有帝国在乡军人会、海军协会、海军有终会、国体拥护联合会、时局协议会、爱国妇人会、壮年团中央协会、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全国神职会、佛教联合会等74个右翼群众团体。内务省还整顿强化部落会、邻保班、町内会和邻组，作为精神总动员的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初期，各加盟团体的活动重心是召开认识时局的演讲会，组织会员参拜神社，祈祷军人平安和战争的胜利。爱国储蓄运动是在1937年的厉行勤俭、增进国力的目标下实施的，也称“国民储蓄奖励运动”。《关于奖励国民储蓄》和《关于百亿储蓄强调周》两则史料说明政府是如何对国民进行储蓄动员的。1938年10月5~11日的“支持统后后援强化运动周”的重点是“慰灵和祈祷”“彻底邻保相助”。1938年，废品回收运动蓬勃展开，在商工省的计划指导下，一些国民基层组织承担了重要物资的节约、回收废品以及捐献毛毯运动。

1939年2月，政府意识到战争有可能长期化，于是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方策》，4月11日，内阁制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展之基本方针》。由此，政府做好了以国家总动员、国民总动员为特征的战时体制所必需的法制建设和精神准备。相关史料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阁训令》《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实施纲要》《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等。1940年，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被废除后，设立了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该机构举行了一些活动，如参拜神社、皇陵，召开拜读敕语典礼；举行阵亡者慰灵祭，慰问军人家属，迎送出征士兵和“英灵”；奖励武道（柔道、剑道），做广播体操；进行清扫等劳动服务；开展为国防捐款，购买国债运动和储蓄报国运动；开展增产运动；等等。

### 3. 开展“近卫新体制运动”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日本国内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开展了“近卫新体制运动”。其主

要内容有：取缔各种政党，不仅不允许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团体存在，就连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也一律解散；建立大政翼赞会，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妇女团体领导人组成，大政翼赞会把各种社会团体纳于自己的属下，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之实现”为目标，组织各职业和地区的“臣道之实践”；在基层的村设立“部落会”，町设立“町内会”，街道设立“邻组”；建立镇压和统治各界群众的“报国会”，利用报国会对工人团体、农民团体、青年团体和妇女团体等强制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在工人中鼓吹“劳资一体”“企业一家”；把议会变成翼赞议会；实行近卫经济新体制。近卫新体制是新一轮的战时体制，是战时体制的最高表现形式，其实行标志着日本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

1945年7月，情报局颁布了《关于实施昂扬国民士气的启蒙宣传要领》，对如何昂扬士气、进行广泛宣传进行了规定，包括宣传方针、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宣传方法及其实施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所谓“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重要宣传，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穷途末路时采取的一种企图让国民充当侵略战争炮灰的宣传策略。

#### 4. 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制

战时体制下的舆论首先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舆论只被允许鼓吹战争的理论、宣传战争的正义、鼓励国民支持战争。《对相关时局的言论、文书的管制的通牒》《关于言论管制》《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临时取缔法》等相关史料显示了当局扼杀民众的言论和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当局在思想文化领域摧残一切进步文化事业，封杀社会主义思想和一切民主思想，陆海军、各省厅陆续发布命令和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使得报纸、杂志、广播、出版等无一不纳入了战时体制。当局根据《国家总动员法》设立了“日本新闻会”，负责三项内容：一是报纸编辑及其他方面的统制指导；二是完善有关新闻事业（合并等）的指导、资助；三是报纸用纸及其他原材料的配给、调剂。由于日本国内纸张资源日益紧缺，1938年报纸的纸张供给受到工商省的限制。1941年内阁设置了“报纸杂志用纸统制委员会”，情报局总裁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用纸实权从工商所转移到情报局，发挥了言论统制的最大

作用。<sup>①</sup>由此，杂志在内容和用纸两方面均受到管制。

日本当局 1939 年开始对杂志行业进行整顿、合并，截至 1940 年 12 月，与出版业相关的各种私人团体均被解散，而在政府主导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设立，之后“日本出版会”又取代了“日本出版文化协会”。1941 年 1 月，以敕令形式发布的《报纸等刊载限制令》规定出版物禁止刊载以下事项：其一是有关主管官厅指定的总动员业务的机密；其二是总理大臣指示的事项，包括可能对外交产生重大妨碍的事项，可能对贯彻财政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妨碍的事项，其他可能对实施国策产生重大妨碍的事项。<sup>②</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版界已完全置于战时统制之下。1941 年 12 月《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临时取缔法》公布，严禁报刊登载违反国策、妨碍战争的消息。同月，《新闻事业令》以敕令形式发布。该法令对报纸的编辑、出版、运营等做出了严格规定。1942 年 2 月 5 日，日本新闻会成立。政府凭借权力强制对新闻报纸事业进行统制，以内阁告示形式将全日本的 104 种日刊报纸列为日本新闻会的会员。1943 年 2 月施行的《出版事业令》规定：当主管大臣认为有必要时，对出版业主，可命令其将事业转让、让与、合并等，当该出版事业的运营对国策的贯彻有重大妨碍或可能有重大妨碍时，可命令其停止或暂停运营。随着国家以舆论统制与言论统制为目的对报纸行业的统合，最终，新闻媒体沦为宣传和支持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和喉舌。在统制之下，报刊充斥了歌颂战争的报道和消息，对煽动国民情绪起到很大作用。

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事业被置于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受到严格统制。整个战争期间，新闻稿、评论都要由政府严格审查，播音员的人选也要严格挑选。那些信奉自由主义和与当局思想不一致者不被准许进入电台从事广播工作。当局还规定了播音员的语气、语调，禁止播音员加入主观成分或采用激烈语气。

电影在战时体制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的管制，成为鼓吹战争正义、鼓动群众支持战争的宣传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勉励即将出征的丈夫到前线“英勇作战”而自杀的井上千代子的事件成为军国“美谈”，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时间各电影公司纷纷制作了反映井上千代子“贞烈”事迹的电影。另外，以

① 『新聞指導方策について』（1940 年 2 月）、内川芳美編『マス・メディア統制 2』みすず書房、1975。

② 〔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 216 页。

“炸弹三勇士”为主题拍摄的电影也迅速在全日本上映。七七事变后情报局和陆海军报道部及在外派遣军，纷纷向电影公司负责人要求拍摄鼓舞士兵士气、宣传国策的影片。1943年8月11日，第五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电影政策的具体方案》，该方案是在“大东亚战争”决战阶段，日本政府在电影方面的政策和要求。当局强调要树立电影的国家目标，加强电影宣传，希望在战争残酷阶段，发挥电影的作用，引导国民树立胜利信心。在当局对电影界的统制下，电影失去其艺术价值，成为煽动战争情绪、为统治者鼓噪的工具。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民众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观看那些歌颂战争、为“皇军”歌功颂德的军事题材的电影，通过看电影来了解战事、统一思想、凝聚支持战争的力量。

为了强化对言论的统制，使战争顺利进行，1942年，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和监督下，思想家、评论家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德富苏峰）。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是对国家政策全力支持的组织，成立后召开了诸如“击灭英美思想演讲会”等大型会议，编著有《思想战大学讲座》《日本思想战丛书》等书，在思想领域对当局的侵略战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1942年，在内阁情报部的要求下，以“日本文艺中央会”为中心，“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加入该报国会的作家超过了4000人，几乎囊括日本所有作家。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作家全都处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之下，那些客观描写战争或反映战场暴虐、残酷的文学作品全部被封杀了。

## （二）对国民的组织动员

在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一方面不断推进海外战场，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加紧动员和组织民众加入各种组织，积极配合战争的进程。随着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为进一步强化战时体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38年1月制定和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月公布），该法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以及工农运动等方面的内容，目的是把全日本的国民经济、政治、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包括将必要的人力资源、物资资源纳入战争轨道。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海外战死、伤残、失踪士兵人数不断增多，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必要兵力，内阁接连制定了征用令用来补充兵员，

甚至对那些本来不够服役条件的工人、农民进行了征兵动员。大量的征兵导致工厂和农村劳动力匮乏。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当局发布了一系列动员国民到工厂、农村从事生产的法规和政策，强制民众参与战时经济体制，使他们成为经济战的战士。因此，在总体战的体制下，日本国内的“銃后”成为战场，所有的领域都战时体制化了。

1939年7月8日，平沼骐一郎内阁发布了敕令《国民征用令》。该法令是在国家总动员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定军需生产等国家总动员领域的从业者均为国民征用对象，在通过职业介绍所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由军部大臣提出请求，由厚生大臣向地方官发布征用命令；地方官向被征用者送交标明其居住及就业场所、职业、技术程度、身体状况、希望等内容的征用令，决定被征用者到军火生产部门报到。<sup>①</sup>该法令建立了全国性义务劳动体制，奠定了日本式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的基础。由此，数量庞大的日本国民被动员到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从事对战时体制的劳动力奉献。

在《国家总动员法》的基础上，1939年1月，政府发布了国民申报职业能力的命令。8月，发布了要求医师、牙科医师、药剂师、护士申报职业技能的命令。日本当局还通过义务劳动将学生、青年团乃至家庭主妇推向了国家的大舞台。为了让更多的女性作为劳动力补充到经济岗位，充当经济战的战士，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关于促进女子勤劳动员》《女子挺身勤劳令》等。

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研究，1937年纺纱、制丝和丝织业女工人数为83万余。1944年金属和机械工业有90.8万以上女工。1944年有12.3万女性在矿山从事劳动，而1929年这一数字仅为5.2万人。交通业1944年有26.5万女性从事劳动，比1929年的3.9万人增加了约6倍。战争期间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很大比例。战前，农业劳动中男女比例是男子67%、女子33%，而1946年4月，日本国内军人和征用人员复员完毕，但海外军人还没有复员，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占57%、男性占43%。<sup>②</sup>

1941年11月22日，当局以敕令形式公布了《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该敕令以14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性与14岁以上25岁以下的单身女性为对象，

①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5 現代』岩波書店、1997、第87～88頁。

② 〔日〕井上清：《日本妇女史》，周锡卿译，三联书店，1958，第257~259頁。

动员他们组成勤劳报国队，到军需工厂、矿山、农村等进行无偿劳动。1943年，内阁制定了《学徒战时动员体制确立纲要》，于是，初高中学生在“学业即劳动”的口号下加入了战时体制。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体去农村参加劳动，每年一个月。此后，这一时间被加长，甚至连低年级学生都必须参加。1944年，内阁通过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如《紧急学徒勤劳动员方策纲要》《决战非常措施纲要》《决战非常措施纲要为基础的学徒动员实施纲要》。8月，作为学徒动员的基本法《学徒勤劳令》以敕令形式公布，动员旧制中学以上的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编成学校报国队，到各地从事军需生产、粮食增产劳动。1945年，侵略战争进入了最为残酷的阶段，为了确保劳动力，政府废除了以前的诸多法令，3月制定了《国民勤劳动员令》，成为向各工厂、各企业事业所派遣劳动力就业的最彻底化的法令。1945年初，日本所有学校停课，被动员的学生高达300万人。据统计，1945年7月，全日本的学生被动员了343万人，据推测，由于不熟悉生产技能而在事故中死亡或受伤的就有6万多人。

### 1. 官方妇女团体

1931~1945年的侵略战争期间，随着战事的扩大和战线的延伸，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被派往战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在总体战方针下被动员起来，成为“銃后”的主力军，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妇女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被卷入疯狂的战时体制中的。这些随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而急剧膨胀的妇女团体是官方授意和直接领导下的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

爱国妇人会是成立于1901年的以军事后援为目的的国家主义妇女团体，在1931年之前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妇女组织。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爱国妇人会实现了一次次跳跃式发展。她们制作慰问袋<sup>①</sup>、慰问军人家属、捐献军用飞机、慰问伤病军人，开展了“强化銃后家庭运动”，并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号召未婚的妇女会员“结婚报国”，嫁给伤残军人，育龄妇女要为“皇国”多生孩子。大日本联合妇人会成立于1930年12月，是在文部省领导下以町村妇女为基本单位，联合了全国母之会、主妇会、地区妇女会的全国性官方妇女

<sup>①</sup> 慰问袋是日本妇女手工缝制的小布包，可以将日常生活用品放进去。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制作了大量慰问袋寄往在海外战场的军人。

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3月18日的大阪国防妇人会。1932年10月24日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章程及会则》是研究该团体的重要史料。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宗旨是：秉承世界无与伦比的日本妇女的美德；不受反战之类思想的迷惑；作为母亲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孩子；作为主妇忍耐任何消费生活的窘迫；慰问前线士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怀着一颗“母亲或姐妹之心”照顾伤病士兵和阵亡者的遗属。国防妇人会的活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军事扶助为中心，后期加上了“家庭国防”的内容。七七事变后，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发展迅速，会员数有了突飞猛进的上升，1937年末达到了685万人。

1941年6月10日，内阁最终决定将三个妇女团体统合，并就合并事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41年8月19日《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结成共同声明》发表，1942年当局将这三个妇女团体合并成立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妇人会纲领》和《大日本妇人会总发起决定》体现了大日本妇人会的宗旨：“我们是日本妇女，敬神畏诏，为皇国奉公；我们是日本妇女，竭诚、以劳动为乐、为社会为人类而努力；我们是日本妇女，修身、齐家、发扬日本妇道之光辉。”该妇女团体号召全体日本妇女在必胜的信念之下，为军人奉献，努力生产，为决战效力。大日本妇人会的对象是20岁以上的全体日本妇女，成立后第一年会员人数就达到了1900万。1945年6月，大日本妇人会被编入国民义勇队。

## 2. 町内会、部落会与邻组<sup>①</sup>

近世以来日本社会有着传统的五人组、十人组制度。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即向各府县下达了《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備纲要》，按地区把居民组成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城市设“町内会”，农村设“部落会”。邻组就是在地方行政的最基层组织町内会之下，模仿历史上建立五人组、十户组的传统建立的。其按居住区域设置，一般以十户为一组。1940年末，全日本共有113万个邻组，第二年5月达到133万。1941年2月已建立502个郡支部，175个市支部，82

<sup>①</sup> 邻组的历史很长，从唐朝引进的制度中有五家一保制，即在五家中如遭到犯罪袭击或自己产生犯罪现象，组织内部有向官府通报的义务，有对犯罪者进行看管防止其再犯的义务，目的是防止犯罪和对犯罪人进行处罚。



个区支部，1万多个町村支部。担任町会和邻组组长干部的主要是中小工商业主、退役军人、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官公署职员、神官、僧侣以及其他社会阶层。1942年8月，内阁会议决定将部落会、町内会和邻组囊括在大政翼赞会中。

邻组作为法西斯体制的细胞组织，是处于大政翼赞会领导之下的国家意志渗透的基层机构，它传达和贯彻政府方针、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起到了“上意下达、下情上通”的作用。邻组也是国家统制、经济统制之外对国民统制的另一种手段。当局通过每月定期召开的邻组例会来实现对邻组的管理。《部落会町内会整备指导的训令、通知》对例会的召开做了明文规定，如齐唱国歌、遥拜皇宫、奉读敕语、宣誓、报告、座谈、悼念阵亡日本军人等。1941年7月1日，通过广播节目的主持，实现了全国邻组例会的统一召开。邻组成员一齐随收音机广播唱国歌、遥拜皇宫。邻组用“回览板”传达战争的信息和政府的指令。邻组还是动员、训练、思想统合的单位，通过送迎“出征军人”、慰问军人遗族和家属、缝制“千人针”、召开各种演讲会等活动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统合。

战争期间，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实施了生活物资配给制和凭票制等制度，而邻组是这一国家政策的最终执行者，一些诸如物资配给、居住登记、摊派公债、强制储蓄、金属回收、防空演习、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等，都是通过邻组实现的。邻组的组长管理各家的配给手册、检查组员的行踪，就连群众的日常穿衣、发型等生活琐事都要受到邻组的干涉。由于男性大部分都上了战场，所以，邻组的成员主要是妇女与老人。

战时的邻组是彻底的国民动员和家庭统制机关。日本当局通过这些邻保组织，将全体日本社会基层组织在其居住地官僚机构的基层组织町内会和邻组里，以达到贯彻统制和动员。1942年东条内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町内会、部落会及邻组，以控制基层组织，内务省和警察局依靠邻组来严密监视群众，发挥了居民之间相互监督的作用，使每个人置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层层组织网中，处于法西斯体制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下。邻组成员有义务揭发对政府不满的人和事，如有人不服从或不积极参加邻组活动，就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或被视为“国贼”而受到惩罚。邻组成员发现持有与国政、国策不同的思想者，即对其施加压力，并以各种方法帮助其提高对国体的认识，使之成为真正的“爱